

# 論中共的對外開放政策

趙春山  
(國關中心副主任)

壹、導論

貳、中共對外開放政策的形成  
叁、中共對外開放政策的實踐  
肆、中共對外開放政策的影響  
伍、結論

## 壹、導論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至廿二日，中國共產黨在北京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在這次會議中，中共除了決定把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方面外，並且提出了進行經濟改革的任務和決定實行對外開放的政策。從此以後，實行對外開放政策，便成為中共推動社會主義改革的一個重要內容和重要特徵。

在共黨國家內部，有關改革的必要性問題，比較容易產生共識。例如，從馬克思主義的觀念出發，改革被視為解決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一項行動。換言之，矛盾不需要透過劇烈的對抗和衝突的形式來解決，而可以通過社會主義的內部力量，通過社會主義制度自身的調整和完善來解決。因此，「社會主義改革從本質上來說，是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的性質

和上層建築一定要適合經濟基礎這一客觀規律的要求，是這一規律起作用的必然結果。」<sup>①</sup>

其次，從社會主義實踐的觀點看，改革是為了替社會主義找「出路」，是為了迎合時代的要求和各國人民的普遍呼聲。隨著各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經濟和政治體制的弊端日益明顯。在這種情況下，不改革原有的體制，「社會主義生產力就不能充分發展，社會主義建設就不能順利進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就不能充分發揮。」<sup>②</sup>

① 李忠杰、徐耀新、魏力，社會主義改革史（北京：春秋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二月），頁二二三。

② 同上，頁四。

再次，社會主義改革被視為人們對於社會主義進行「再認識」的結果。換言之，要跳出過去對於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產生的認識觀。因為這種認識「已經附加了馬克思主義原來所沒有的東西，甚至某些方面已經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的原理。」<sup>③</sup>最後，改革被視為當今世界新技術革命推動的結果。隨著電子計算機、空間技術和生物遺傳工程等尖端科技的發展，改變傳統落後的管理形式和領導方法，提高管理能力和水平，成為刻不容緩的任務。<sup>④</sup>

從以上的論據出發，研究社會主義改革史的中國大陸學者，將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潮流，視為一種「歷史的必然性」。然而，如果我們從權力「合法性」（legitimacy）的觀點從事深一層地探討，我們就會發現，共黨國家在歷經「建立政權」和「鞏固政權」，從而步入「管理政權」的發展階段時，改革幾乎成爲當權者尋找其「權力合法性」的唯一來源。換言之，在缺乏意識形態和「政治媚力」（Charisma）來合法化其權力地位的情況下，後革命時期的共黨領袖，勢必要改變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傳統關係。研究蘇聯問題的凱瑟（Robert G. Kaiser），曾提出「歷史性的討價還價」（The historic bargain），來說明這種關係。此即：「民衆放棄他們選擇領袖和影響政策的權力，以換取基本的安全、秩序和日常生活的必需品。」<sup>⑤</sup>統治者以政策來改變現有體制的不合理部分，是他們和民衆「討價還價」時，必須付出的代價。

無論從那一個角度看，改革的共識是比較容易建立的；但開放的問題就更複雜和更難以一致了。對於這點，中共學者即坦言：

「一些人存在一些模糊的認識，一些人有著各種憂慮，有的人把目前我國出現的各種經濟、政治、社會以及意識形態領域中的各種問題都統統歸咎於『對外開放』，似乎一切問題，各種污七八糟的社會現象的禍根都在於『對外開放』，正是說明了這一點。」<sup>⑥</sup>

爲了深一層探討中共的對外開放政策，本文將從政策的形成，政策的實踐，以及政策的影響三個部分，建立分析架構。希望藉此對於中共這項關係重大的政策，獲得全面性的瞭解。

## 貳、中共對外開放政策的形成

任何一項公共政策的產生，都不應該是即席創造的結果。分析中共對外開放政策的形成，首先我們應該澄清中共的「對外開放」概念，研究中共爲什麼要對外開放。這些問題有的根源於共黨意識形態，有的是基於中國大陸主觀和客觀環境的需要。

③ 同上，頁五。

④ 同上，頁五六。

⑤ Quoted in Mary Costello, "Russia under Andropov," *Editorial Research Reports*, Vol. 1, No. 1, January 7, 1983, p. 20.

⑥ 馮特君、王曉峰，對外開放與今日中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一年五月），頁二二二。

開放」概念，研究中共為什麼要對外開放。這些問題有的根源於共黨意識形態，有的是基於中國大陸主觀和客觀環境的需要。

(3) 同上，頁五。

(4) 同上，頁五六。

(5) Quoted in Mary Costello, "Russia under Andropov," *Editorial Research Reports*, Vol. 1, No. 1, January 7, 1983, p. 20.

(6) 馮特君、王曉峰，對外開放與今日中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一年五月），頁11～111。

## 一、中共的對外開放概念

何謂對外開放？根據大陸學者的定義：「對外開放是對閉關鎖國而言，它是主權國家的一種政策和一種行為。每個主權國家，作為國際舞台上的一个行爲主體，為了維護和實現自己的國家利益，在處理對外關係中奉行的一種政策和行為。」<sup>⑦</sup>這種的定義，似乎是對「對外開放」一詞，採取了廣泛的解釋。對外開放予人一般的認知上，似乎不應屬於單一的經濟概念。提供這個定義的大陸學者亦明白指出：「隨著經濟聯繫的增強，必不可免的有政治的相互影響和文化的彼此交流以致思想的雙方傳播。」<sup>⑧</sup>但另一方面，如果我們仔細觀察大陸學者引用馬列經典著作來為「對外開放」找尋理論依據時，我們不難發現，中共的對外開放概念，應是偏向經濟層面的。作為中共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對於中共「對外開放」的詮釋，更加證明了這一認識。

理論是行動的指南，共產黨人一向標榜：「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運動」。涉及對外開放的理論，中國大陸學者認為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歷來都將社會主義社會視為一個開放的社會，要發展社會主義，就必須要對外開放。大陸學者引述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的話說：

「資產階級，由於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過去那種地方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sup>⑨</sup>

列寧在十月革命後提出的「和平共存」概念，亦被中共學者用來證明發展社會主義就必須實行對外開放。列寧指出：

「我們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在資本主義包圍中利用資本家對利潤的貪婪和托拉斯與托拉斯之間的敵對關係，為社會主義共和國的生存創造條件。社會主義共和國不同世界發生聯繫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情況下應當把自己的生存同資本主義的關係聯繫起來。」<sup>⑩</sup>

列寧提出的和平共存概念，目的是為了打破孤立，鞏固新生的蘇維埃政策，進一步促使蘇俄政府發展和壯大。其中，經濟聯繫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對此，蘇聯外交史學者有下列的詮釋：

「列寧當初注意到一個事實，及各國之間並非同時過渡到新社會主義制度。因此，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在一段

(7) 同上，頁三。

(8) 同上，頁三四。

(9) 引自徐銀山，「鄧小平的對外開放決策思想初探」，*決策與信息*（武漢），一九八八年第一期，頁四六。引自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複印報刊資料

，D六中國外交，一九八八年第四期，頁廿九。

(10) 引自馮特君，對外開放與今日中國，頁一九。

相當長的時期內會同時存在。儘管政府與社會制度不同，它們商業上的接觸是不可避免的。列寧強調，不僅社會主義國家需要從事國際經濟關係及貿易行為，資本主義國家也有此需要，這給和平共存一個實際的基礎。」<sup>⑪</sup>

列寧的和平共存概念，對於中共早期的外交和對外貿易政策，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中共學者在提到兩者之間的關係時強調：「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列寧和平共處思想的堅持和發展」。面對中共政權成立初期的內外形勢，中共學者認為：「中國為了爭取社會主義建設的和平國際環境，揭露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在堅決保家衛國的同時，也有必要堅持和平共處的外交方針，把它作為同任何國家建立外交，進行經濟合作的準繩和處理國際關係的依據。」<sup>⑫</sup>

作為中共處理對外關係的基本原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當然不僅包含經濟的領域。但值得玩味的是，這五項原則最初卻是出現在周恩來於一九五四年四月，代表中共和印度就西藏地方邊界貿易和宗教問題的談判所簽的協定上。很明顯地，在突破中共外交孤立的戰略上，經濟是一項重要的考慮。中共的和平共處原則，目標也不限於亞非國家。一九五四年八月十一日，周恩來在中共「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三十三次會議」的「外交報告」中強調，中共和英國的關係在日內瓦會議期間得到了改進。「這種改進將有助於我國和西方國家建立正常關係的可能性的增長。在此期間，我國和西方國家間的貿易來往和文化交流，也有了新的發展。」<sup>⑬</sup>隨後，劉少奇在一九五六年九月中共召開的「八大」「政治報告」中，更明白指出：「我們以五項原則為基礎的和平共處政策，不排斥任何國家。對於美國，我們也同樣具有同它和平共處的願望。」<sup>⑭</sup>

中共學者認為，早在中共政權成立前夕，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就明白指出願按照平等原則，與一切國家建立外交關係。毛特別重視發展對外經貿關係。例如，在「論十大關係」一文中，毛澤東表示：「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但是，必須有分析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運。」<sup>⑮</sup>

毛澤東的「對外開放」論點，固然包含了學習經濟以外的其他部分。但「論十大關係」的提出，卻是以總結中共「建國」以來和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的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經驗作為背景，其經濟的設想，不容置疑。

最後，我們必須強調，形成中共「對外開放」概念的主要論據，應是鄧小平的想法。鄧小平的對外開放思想，被視為「<sup>⑯</sup>V. I. Popov, I. D. Ovsyany, V. P. Nikhamin, eds., *A Study of Soviet Foreign Policy*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75), p. 15.

⑰ 徐藍，「從列寧的和平共處思想到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北京師範學院學報，社科版，一九九一年第六期，頁三六～四四，三五。引自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複印報刊資料，D七外國政治、國際關係，一九九二年第一期，頁二五。

⑱ 一九五五年人民手冊，一九五五年一月，大公報社出版，頁三三六。

⑲ 人民日報，一九五六九年九月十七日。

⑳ 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第七四〇頁。引自馮特君，對外開放與今日中國，頁二四。

馬克思主義的普通真理同中國的具體實際的結合」，對於中國大陸邁向開放的轉變，起了決定性的作用。針對鄧小平關於對外開放必要性所作的論述，中共學者強調：第一，鄧小平真實地指明了中國大陸落後的狀況；第二，鄧小平認為：「中國長

料中心，複印報刊資料，D七外國政治、國際關係，一九九二年第一期，頁二五。

- (13) 一九五五年人民手冊，一九五五年一月，大公報社出版，頁三二六。
- (14) 人民日報，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七日。
- (15) 毛澤東著作選談下冊，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第七四〇頁。引自馮特君，對外開放與今日中國，頁二四。

馬克思主義的普通真理同中國的具體實際的結合」，對於中國大陸邁向開放的轉變，起了決定性的作用。針對鄧小平關於對外開放必要性所作的論述，中共學者強調：第一，鄧小平真實地指明了中國大陸落後的狀況；第二，鄧小平認為：「中國長期處於停滯和落後狀態的一個重要因素是閉關自守。」第三，鄧小平指出，沒有對外開放，中國大陸不可能實現四化，達到既定的戰略目標。第四，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對外開放是必由之路；第五，鄧小平認為對外開放不會傷害到社會主義事業，不會變成資本主義。<sup>⑯</sup>

鄧小平對於中共對外開放的認識，顯然是從經濟利益出發的。另一方面，從鄧小平提出的對外開放原則，我們可以理解，鄧小平亦擔心，對外開放的結果，可能產生經濟以外的其他負面效應。例如，鄧小平認為：必須「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實行對外開放」；「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積極擴大對外交流」；「實行開放政策，不能搞資產階級自由化。」更重要的是，鄧小平的「堅持兩手抓」和「兩點論」。前者代表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嚴厲打擊經濟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後者指的既看到對外開放的意義，也看到它可能帶來的消極影響。<sup>⑰</sup>

總而言之，無論從馬列意識形態，或是從毛澤東、鄧小平等中共領導人對於對外開放的詮釋看，對外開放一詞帶有濃厚的經濟意涵。針對對外開放在認知上可能造成的偏差，特別是防範開放帶來的「消極影響」，中共自然要將對外開放限定在一種「有原則、有條件、有限度的」標準，不容對外開放違背社會主義建設的大方向。

## 二、中共對外開放政策的國際背景

科技的高度發展，特別是交通工具的日新月異，縮短了國與國，乃至於人與人之間的距離。處在這樣一個天涯若比鄰的小小世界，幾乎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孤芳自賞，真正作到自給自足的地步。因此，各國之間的互利互補，經濟上的相互依存，已成為不可避免的一個趨勢。對於中共而言，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陣營在經濟力量對比中的消長；亞洲四小龍，特別是台灣在經濟發展上創造的「奇蹟」，都對中共的對外開放政策，形成刺激性的動力。

首先，讓我們觀察一下，中共對於整個世界經濟發展趨勢的認知狀況。根據中國大陸經濟學者的看法，新技術革命作為一種強大的變革力量，導致了世界經濟格局的重大變化。這種變化大致表現如下：

第一、各國之間的相對經濟實力，一國之內各產業之間的相對競爭能力，將發生重大轉移。能夠迅速適應世界經濟變化的國家日趨強大，反之則將衰弱；

(16) 蔣寶祺、趙一明，「中國對外開放事業的理論指南——學習鄧小平對外開放思想的一點體會」，經濟科學（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第四期，頁一三。

(17) 同上，頁五六六。

第二、國內和國際的服務供給體系正在發生較大的變化。一旦服務供給成為日常事務，便可能把服務輸送到遙遠地區，服務貿易將成為一項重要的國際貿易；

第三、隨著技術國際性擴散的不斷加速，國內外將湧現大量新的競爭者，從而加劇世界競爭；  
第四、勞動力需求的世界格局將以不確定的方式發生變化。例如，在採用新設備和新生產技術的過程中，一些領域的勞動力需求下降，另一些領域的勞動力需求上升；

第五、在當前和未來的競爭中，企業必須掌握更多的全球發展知識。一個獨自發展的意識已不合時宜。<sup>⑯</sup>

受到這種科學技術革命的影響，經濟生活的國際化趨勢日益加強，全世界經濟結成了統一的體系，各國經濟相互依賴和相互影響。在此，「國際化」是一個值得重視的概念，中共經濟學者作了以下的詮釋：

首先，經濟生活的國際化表現於國際貿易的迅速發展。由於各國對於外部市場的依賴度提高，因此必然要以對外開放來積極開拓國內、國外市場，以及充分利用國內、國外資源；

其次，生產過程的國際化是經濟生活國際化的重要特徵。生產社會化和國際分工的發展，導致生產國際化的發生。由於各國生產與世界經濟密切相聯，一個國家若想保持經濟獨立性，只有通過開放，吸引先進的生產技術和管理經驗，參與國際分工環節，不斷促使本國產業結構升級，才可能在國際競爭中保持優勢，使經濟具有獨立性；

再次，經濟生活國際化也表現在資本的國際化上。由於經濟發展所需資金龐大，非一國自身所能負擔。因此，通過對外開放，利用國際資本流動來彌補建設資金之不足，則成為必要的手段；

最後，經濟生活國際化，亦表現在其他像是國際勞動力的流動、科學技術和專利的跨國傳遞、以及各國經濟政策的相互協調等活動的國際化上。只有對外開放才能吸引人才，才能引進和利用其他國家的先進技術，縮短與其他國家的差距。<sup>⑰</sup>

由此可見，中共實行對外開放，乃是為了適應世界經濟變化和國際經濟關係變化的要求。除此之外，由於對外開放而促使許多國家經濟高速增長的成功經驗，必然帶給中共重大的啓示。有關對外開放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關係，中共學者認為，在資本主義歷史上，地中海沿岸、尼德蘭低地的經濟發展程度，原先是高於英國的。但後者在近百年中充分利用國際經濟聯繫，大力發展對外貿易，促進國內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變革，由後進變為先進，在十八世紀超過了荷蘭，以經濟強權建立了龐大的殖民體系。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美國和德國通過開放，充分利用後發優勢，趕上並超過了英國和法國。第二次世

<sup>⑯</sup> 周振華，「對外開放政策的國際背景分析」，《財貿經濟》（月刊），一九八八年第八期（總八〇期），頁五八。

<sup>⑰</sup> 方生主編，《走向開放的中國經濟：理論、模式、路線》（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一九九一年），頁一三三—四。

了廣大的殖民體系。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美國和德國通過開放，充分利用後發優勢，趕上並超過了英國和法國。第二次世

- (18) 周振華，「對外開放政策的國際背景分析」，《財貿經濟》（月刊），一九八八年第八期（總八〇期），頁五八。
- (19) 方生主編，走向開放的中國經濟：理論、模式、路線（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一九九一年），頁一三、一四。

界大戰後，日本和德國從戰爭的廢墟中重建，成為經濟強國，更能說明對外開放在促進發達國家經濟增長方面起的重大作用。<sup>⑳</sup>

然而，對中共更具刺激作用的是亞洲「四小龍」的崛起，其中以台灣的經濟飛騰最為凸出。中共學者指出，「四小龍」的條件並不怎麼好。資源有限，能源短缺之外，還存在著地少人多、人口密度高的缺點。「但為了尋找出路，從六〇年代開始，這四個國家和地區都揚長避短，紛紛選擇了全方位開放的道路，利用世界資金、世界市場、世界資源、世界人才，借助外部條件和力量來促進本國和本地區的經濟發展。」尤其是，「從台灣幾十年的發展中，我們更清楚地看到，要想加快經濟發展的步伐，就必須要積極推行對外開放的政策。」<sup>㉑</sup>

### 三、中共內部經濟建設的迫切需要

雖然中共學者引述毛澤東的談話，說明中共政權成立前後，毛澤東即認識到對外開放對於中共本身的存在和發展，具有重大的意義。但實際上，從中共的政治發展過程看，有相當一段漫長的時期，是處在「閉關自守」的狀態。中共將這種狀態歸咎於內外兩股勢力的作祟。

在外在因素方面，中共認為，由於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長期對中國大陸從事「政治孤立」、「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使得「西方的大門緊緊地向中國關閉著。」雖然，最後中共被迫向蘇聯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靠攏，但當中蘇共鬧僵後，「這扇大門又被關上了」。在內部因素方面，六〇年代以後的極左思潮，包括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幫」事件，使中共的封閉狀態雪上加霜，推向了極端。<sup>㉒</sup>

實際上，造成中國大陸長期封閉的主要原因是中共內部權力鬥爭和永無休止的政治運動，使中共一步一步地走向「自我孤立」的狀態。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領導當局才逐步擺脫這一「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工作重心，轉而強調經濟建設的課題，發展生產力成為首要的政策目標。為了完成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目標，中共同時提出了「三步走」的戰略佈署：

第一步，從一九八〇年到一九九〇年，使國民生產總值在一九八〇年的基礎上翻一番，基本解決人民群衆的「溫飽」問題；

第二步，從一九九〇年到本世紀末，使國民生產總值在一九八〇年的基礎上再翻一番，使人民生活達到「小康」的水平；

<sup>⑳</sup> 同上，頁二。

<sup>㉑</sup> 有關中共對「四小龍」發展經驗的分析，參考馮特君，對外開放與今日中國，頁四二、四六。

<sup>㉒</sup> 馮特君，對外開放與今日中國，頁一四。

第三步，到下一世紀中葉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sup>23</sup>

為了達成上述的目標，以中國大陸內部既有的條件是不夠的。因此，改革開放遂成為必要的手段。中國大陸學者認為，對外開放對於中共的經濟建設，可以提供下列的貢獻。

第一、實行對外開放，可以經由積極吸引和利用外資，解決中共經濟建設中資金不足的困難；

第二、實行對外開放，有利於吸收國外先進的科學技術。整體而言，中共科技水平落後於發達國家，大部分工廠企業的設備都比較陳舊，對外開放可以很快地提高中共的科技水平；

第三、實行對外開放，有利於學習外國經營管理的先進經驗，可以促使生產力的發展。<sup>24</sup>

作為經濟建設的一個手段，對外開放絕非孤立存在的，簡言之，從國家經濟走向世界經濟的過程中，「這不僅是打開關閉的大門問題，而是要求進行一場體制、戰略、政策的深刻變革。」中共學者認為，「沒有這種深刻變革，便無法實行這種完整意義上的對外開放。」其原因在於：

第一、僵硬的體制無法適應世界經濟的迅速變化；

第二、傳統發展戰略不利於加入世界經濟一體化；

第三、保護主義政策不利於改善宏觀經濟環境。<sup>25</sup>

單純就對外經濟開放與經濟體制改革之間的關係而論，中共學者認為，「對外經濟開放離不開經濟體制改革；反過來，對外經濟開放又有利於推動經濟體制改革。」從中共的觀點看其關聯性在於：

第一、「對外經濟開放有利於增強人們的改革意識。」當中共面對世界的時候，自然會感覺到傳統體制與國際經濟體系運行原則之間的矛盾，促使其重新檢討舊體制的弊端，從而產生改革的主動性，增強改革觀念；

第二、「對外經濟開放有利於我們確立切實的改革方向。」換言之，使中共能充分認識資本主義世界，了解商品經濟的原則，才能把商品經濟和計劃經濟有機地結合起來；

第三、「對外經濟開放有利於我們借鑒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經驗和教訓。」中共認為學習其成功的經驗，可以加快中共經濟改革的步伐；吸收其失敗的教訓。可以避免別國所犯過的錯誤，減少中共改革的失誤；

<sup>23</sup> 劉國光、汝信主編，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政治、文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一月），頁六四。

<sup>24</sup> 李忠杰等著，社會主義改革史，頁五五五至五六六。

<sup>25</sup> 周振華，「對外開放政策的國際背景分析」，頁五九。

第四、「對外經濟開放有利於我們借鑒發展中國家的改革方略。」許多發展中國家和地區，與中共具有許多可比的經濟條件。因此，它們的一些改革措施、策略，對中共是有「先期試驗」的意義，為中共經濟體制改革，提供了可貴的參考資料。

(23) 劉國光、汝信主編，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政治、文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一月），頁六四。

(24) 李忠杰等著，社會主義改革史，頁五五五～五六。

(25) 周振華，「對外開放政策的國際背景分析」，頁五九。

第四、「對外經濟開放有利於我們借鑒發展中國家的改革方略。」許多發展中國家和地區，與中共具有許多可比的經濟條件。因此，它們的一些改革措施、策略，對中共是有「先期試驗」的意義，為中共經濟體制改革，提供了可貴的參考資料。<sup>②6</sup>

## 三、中共對外開放政策的實踐

中共實施對外開放政策，主要是根據鄧小平針對對外開放所擬定的戰略、策略和方針，加以具體落實。其主要的內容包括實施全方位開放的發展戰略，建立經濟特區和開放沿海城市，以及大力發展對外經濟技術關係。

### 一、全方位開放的發展戰略

鄧小平曾經說過：「我們實行對外開放政策，並不只是對美國、日本、西歐等發達國家開放。對這些國家開放，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是南面合作；還有一個方面，是對蘇聯和東歐國家開放。一共三個大方面。」中共學者認為，這一全方位開放的思想，符合中共內部和國際的經濟狀況，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sup>②7</sup>因為，從中共的觀點看，全方位的對外開放，不僅拓展了中共對外經濟活動的領域，有利於促進中國大陸西北、東北以至西南各省區的整體經濟的發展，而且對於促進歐亞兩大洲的經濟交流，加強中共在全球戰略的地位，有著深遠的意義。更重要的是，一個全方位的對外開放，可以避免中共的經濟受制於某一個或某幾個國家。<sup>②8</sup>

在中共的對外經濟開放中，與資本主義國家以及和發展中國家的關係最為重要。中共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關係，基本上屬於「南北關係」的範疇。中共認為，從經濟結構而論，這樣的關係「互補性」大於彼此之間的「競爭性」，中共取得的利益有：

- (一) 利用中國大陸優勢的生產要素參加國際分工，可以發展廣泛的經貿合作，節約資源，提高經濟效益；
- (二) 隨著分工水平的提高和合作的加強，中共可以動態地從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獲取所需的資源和技術；
- (三) 這種互補性對中共經濟發展有較大的推動作用，因彼此互補內容隨產業結構升級而出現動態發展，為爭取新的分工利益。

<sup>②6</sup> 方生，走向開放的中國經濟，頁三六七～三六九。

<sup>②7</sup> 引自蔣寶祺，「中國對外開放事業的理論指南」，頁三。

<sup>②8</sup> 同上。

益，中共必須實行「追、趕、超」的措施，以保持經濟的活力。<sup>②3</sup>

中共自認屬於發展中國家的一員，雙方的經濟關係屬於「南南關係」的範疇。這種關係有利益和目標一致的地方，也有因爭奪出口市場、引進外資和爭奪國際援助而存在利益衝突和競爭的部份。從中共與發展中國家的共同利益與各自所具有的特殊優勢看：

第一、雙方經濟發展的歷史背景相似；存在的問題，包括工業技術水準不高、經濟結構單一、國內資金不足等也大致雷同，故需要依賴對外經貿事業，充分利用外部資源，加強集體自力更生的力量。

第二、為了擺脫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過分依賴，建立平等互利的國際經濟新秩序，中共認為必須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建立起合作互助的關係；

第三、發展中國家具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和較為廣闊的市場，這對中共的對外開放，具有很大的意義；

第四、中共認為它與部分發展中國家之間，具有經濟上的互補性，這是彼此間進行合作與開放的有利條件；

第五、在與發展中國家進行的經濟交往中，中共可以根據不同的情況，吸引對中共「四化」有益的東西，其中包括物質和技術資源，也包括各種經驗教訓。<sup>④0</sup>

## 二、大力發展對外經濟技術關係

中共學者認為，就對外經濟技術交流與合作來說，主要包括下列五種形式：(一)對外貿易。(二)引進技術。(三)利用外資。(四)國際勞務合作。(五)對外經濟援助。<sup>①</sup>

(一)對外貿易。從對外經濟開放的觀點出發，對外貿易對於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至少可以產生下列的作用：首先，經由國際貿易活動，可以促使本國現有的資源，獲得合理的分配，從而得到相應的利益；其次，由於出口部門的擴大，帶動了其他經濟部門的發展，從而提高了國民收入與增加就業率；第三，與先進國家開展經貿活動，可以借用這些國家的知識技術，並可得到新思想的刺激；最後，對外貿易提供了各方面的市場條件，促進一國的經濟發展。<sup>②2</sup>

中共發展對外貿易有其特殊的主客觀環境。首先，中共的對外貿易是在大陸本身的經濟運行規律，和國際經濟運行規律之間，存在差別條件的情況下發展起來的；其次，中共的對外貿易工作是在國際市場條件錯綜複雜的環境下發展起來的；中

<sup>②3</sup> 方生，走向開放的中國經濟，頁四一～四二。

<sup>③0</sup> 同上，頁四三～四五。

<sup>④1</sup> 李忠杰，社會主義改革史，頁五五七～五五九。

<sup>④2</sup> 方生，走向開放的中國經濟，頁六三～六七。

<sup>29</sup> 方生，走向開放的中國經濟，頁四一至四二。

<sup>30</sup> 同上，頁四三至四五。

<sup>31</sup> 李忠杰，社會主義改革史，頁五五七至五五九。

<sup>32</sup> 方生，走向開放的中國經濟，頁六三至六七。

共的對外貿易長期實行集中統制的管理體制和近年來在有計劃商品經濟原則指導下的管理體制。<sup>33</sup>針對這些特點，中共爲了適應外貿的需要，勢必對整個管理體制，進行大幅度地的改革。其中包括：「將政企職責分開，逐步推行進出口代理制，實行工貿結合、技貿結合、進出口結合的原則，簡化外貿計劃內容，擴大外貿經營渠道和外貿企業的經營自主權。」<sup>34</sup>

(二)引進技術。有關這個概念的界定，中共學者引用「聯合國制定的『國際技術轉讓行為守則』指出：「技術轉讓是關於製造產品、應用生產方法或提供服務所需的系統知識的轉讓，但不包括貨物的單純買賣或租賃。」換言之，技術引進與一般所稱的設備進口，不能混爲一談。誠然，在技術引進的過程中，雖然也包括此一技術所必須附帶的關鍵設備、儀器和器材，但單純的設備進口絕不應視爲技術引進。<sup>35</sup>

涉及引進技術的問題，中共特別強調下列兩點：第一，引進技術應有利於大陸農業的發展。大陸擁有九億農民，農業的現代化與技術進步具有決定性的作用；第二，引進技術的選擇時，應考慮那些能夠擴大就業的勞動密集型技術，俾解決大陸的就業問題。<sup>36</sup>

(三)利用外資。根據中共內外各方面的預測，中共在改革開放和完成經濟發展「三步走」戰略的過程中，對於外資的需求大抵如下：

- 1.根據日本野村證券綜合研究所的數字，中共一九八六至一九九〇年將借入外債二二五億美元，吸收外商投資一三〇億美元，一九九一至一九九五年相應的數字爲二四三億美元和一九三億美元。
- 2.日本工業銀行認爲，到一九九五年，中共將從外部借入資金一〇八六億美元。
- 3.美國蘭德公司預計，中共一九九五年利用外資的安全線爲一〇〇〇億美元，警戒線爲一五〇〇億美元；小林實認爲中共二千年外債爲一五〇〇億美元。
- 4.世界銀行估計，中共在「七·五」期間將利用外資四六〇至五六〇億美元，到本世紀末中共未清償的貸款將爲一二八〇至一五八〇億美元。
- 5.大陸學者在各項預測中提出，本世紀末中共用外資額將在八〇〇至一〇〇〇億美元之間。<sup>37</sup>

<sup>33</sup> 同上，頁七〇至七二。

<sup>34</sup> 李忠杰，社會主義改革史，頁五五七。

<sup>35</sup> 方生，走向開放的中國經濟，頁一〇三至一〇四。

<sup>36</sup> 同上，頁一〇九。

<sup>37</sup> 同上，頁九三。

中共所謂的利用外資，大體上分為三種形式：一是吸引直接投資，包括合資經營、合作經營、合作開發、補償貿易，以及加工裝配等；二是爭取外國政府和國際金融組織提供的中長期、中低利貸款，以及各種名目的開發基金、救濟基金等；三是「一般商業貸款」。其中以吸引直接投資最為重要。中共認為，為了有效地吸引直接投資，必須採取下列措施：一是大中小項目一起上，以中小為主；二是歡迎外國資本家、華僑和台、港、澳資本家一起來；三是適當放寬政策，讓他們有利可圖。<sup>38</sup>（四）國際勞務合作。主要指的是對外承包工程，此外尚包括來料、來樣、來圖加工，到國外開設各種企業、飯店；發展旅遊業，向國外派遣專家、技術工人、醫療隊等。<sup>39</sup>

（五）對外經濟援助。中共的對外經濟援助，長期以來即以第三世界國家為主。早在一九六四年一月，周恩來即趁訪問非洲各國之便，提出了中共處理「對外經濟援助八項原則」，其中包括：1.強調對外援助本平等互利的原則；2.尊重受援國的主權；3.對外經援將是無息或低息的，必要時可以延長還款日期，以減少受援國的經濟負擔；4.幫助各新興國家自力更生，建立民族經濟基礎；5.將以投資小、收效快的原則，使各新興國家在短期內獲得經濟發展；6.以大陸最好產品及國際市場最低價格，把物質供應給新興國家；7.在給予任何特殊技術援助時，必使受援國人員完全學會此等技術；8.所派出的人員，絕不享受特殊待遇。<sup>40</sup>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共雖強調對外開放，但基於本身現代化建設的需要，對外援助計劃並未積極進行。但在「六四」事件後，中共為了突破外交困局，重新強調對外經援工作，對象仍以第三世界國家為主。

### 三、建立經濟特區和開放沿海城市

中共對外開放最引人注目的一个重要な設施是建立經濟特區，開放沿海城市。一九七九年七月，中共中央根據鄧小平的指示，決定對廣東、福建兩省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允許其試辦出口特區。一九八〇年，這兩個省決定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劃出一定地區，建立了經濟特區。

經濟特區，顧名思義，其「特」之處在於實行特殊的經濟政策和特殊的經濟管理體制。中共認為，上述的特殊政策和特殊體制，具體表現在下列四個方面：

第一、特區經濟的發展，主要是依靠利用外資。工業企業的所有制結構，以外商投資企業為主。

<sup>38</sup> 李忠杰等，*社會主義改革史*，頁五五八。

<sup>39</sup> 同上。

<sup>40</sup> Emmanuel John Heui *The Dragon's Embrace: The Chinese Communist and Africa*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67), pp. 8~9.

第二、特區的經濟活動，強調市場調節的作用。

第三、對前來投資的客商，在稅收、土地使用費、人員入出境，以及貨物進出口方面，給予特殊的優惠與方便。

第四、國民營商比民間經濟活動更為活躍。

第一、特區經濟的發展，主要是依靠利用外資。工業企業的所有制結構，以外商投資企業為主。

③8 李忠杰等，*社會主義改革史*，頁五五八。

③9 同上。

④0 Emmanuel John Heui *The Dragon's Embrace The Chinese Communist and Africa*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67), pp. 8~9.

第一、特區的經濟活動，強調市場調節的作用。

第三、對前來投資的客商，在稅收、土地使用費、人員入出境，以及貨物進出口方面，給予特殊的優惠與方便。

第四、國家給特區比較多的經濟活動自主權。<sup>④1</sup>

特區享有的特殊待遇，顯然與堅持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為主的大陸內地，有很大的不同。為了適應新的政策，特區的經濟體制，勢必作出一些調整，建立配套的措施。中共採取的辦法包括：實行政企職責分開；重視運用價值規律和經濟槓杆的作用；改革流通體制和基建管理體制；以及改革人事勞動工資制議等。<sup>④2</sup>

一九八四年二月，鄧小平在視察深圳、珠海、廈門三個特區的工作後，對於特區的功能，提出了以下的說法：此即「特區是個窗口，是技術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識的窗口，也是對外政策的窗口。」除此之外，鄧小平指示要把整個廈門島搞成特區；同時，「除現在的特區之外，可以考慮再開放幾個點，增加幾個港口城市。」鄧認為「這些地方不叫特區，但可以實行特區的某些政策。」<sup>④3</sup>

根據鄧小平的指示，中共中央於一九八四年四月，決定進一步開放天津、上海、大連、秦皇島、煙台、青島、連雲港、南通、寧波、溫州、福州、廣州、湛江、北海十四個沿海港口城市和海南島。為了擴大地方權限和給予外商投資者若干優惠便利，中共聲稱將實行以下政策和措施：

1. 放寬利用外資建設項目的審批權限。
2. 增加外匯使用額度和外匯貸款。
3. 積極支持利用外資、引進先進技術改造老企業。
4. 對中外合資、合作經營企業及外商獨資企業，給予若干優惠待遇。
5. 逐步興辦經濟技術開發區。
6. 大力發展進料加工出口。
7. 調整幾個城市的開放類別。
8. 加強基礎設施建設。

④1 李忠杰等，*社會主義改革史*，頁五五九~五六〇。

④2 同上，頁五六〇~五六一。

④3 鄧小平，「關於經濟特區和增加對外開放城市問題」（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引自堅持改革、開放、搞活：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有關重要文獻摘編（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十月），頁一九二。

9. 加強對利用外資的計劃指導。

10. 在改革方面應當走在前頭。<sup>⑭</sup>

沿海港口城市開放後，中共於一九八五年一月，決定再把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閩南廈、漳、泉三角地區開闢為沿海經濟開放區。一九八八年，遼東半島和山東半島全部對外開放，與原先開放的天津、秦皇島、大連、煙台、青島等連成一片，形成環渤海的開放區。如此，中共繼建立經濟特區、開放港口城市之後，完成了對外開放的第三個層次工作，構成具有宏觀意義的對外開放戰略布局。

## 肆、中共對外開放政策的影響

中共實施對外開放政策十餘年來，中國大陸的政治、經濟、社會，乃至於對外關係，皆遭到重大的衝擊。基於改革與開放之間的密切關係，特別是經濟因素在對外開放政策形成過程中扮演的關鍵角色，大陸經濟生活受到對外開放的影響最大，而中共對這方面的評估也傾向肯定的態度。然而，誠如中共學者所說：「打開了『窗子』，『蒼蠅、蚊子』之類的東西自然會飛進來。」<sup>⑮</sup>這些「蒼蠅」和「蚊子」在中國大陸產生的一系列「失衡」現象，已令中共統治當局感到憂慮，深怕危及整個政權的穩定。於是，隨著中國大陸的對外開放步調，一些涉及政治意味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反和平演變」等運動，亦在中共主導下陸續展開。

### 一、對外開放與大陸經濟體質的變化

中共實施對外開放政策十年後，大陸學者歸納了下列八項具體的成果：

第一，為現代化建設籌措了大量的資金。從一九七九到一九八八年六月，中共對外借款項目達二九五個，協議金額達三九七點二八億美元，實際使用三二〇點七五億美元；吸收外商投資項目達一二一六一個，外商投資協議金額達二八一點五一億美元，實際使用一二〇億美元。兩者相加，中共利用外資項目共計一二四五六個，協議金額達六七八點七九億美元，實際使用四四〇點七五億美元。這些外資對中共的現代化建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第二、引進了一大批先進的技術。從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七年，中共通過各種方式引進了各類技術達一七〇〇〇多項，

<sup>⑭</sup> 「沿海部份城市座談會紀要（節錄）」，引自堅持改革、開放、搞活，頁二〇〇—二〇六。

<sup>⑮</sup> 馮特君，對外開放與今日中國，頁一四一。

有助於整個生產能力的提高。

第三，促進了大陸現有企業的技術改造。「六五」期間，中共引進了三九〇〇多項技術、關鍵設備和生產線，成交金額達三七億美元。中共認為這些工程的項目，大部分於七〇年代末期完成，並可立即投入生產。

使用四四〇點七五億美元。這些外資對中共的現代化建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第一、引進了一大批先進的技術。從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七年，中共通過各種方式引進了各類技術達一七〇〇〇多項，

(44) 「沿海部份城市座談會紀要（節錄），引自堅持改革、開放、搞活，頁二〇〇～二〇六。

(45) 馮特君，對外開放與今日中國，頁一四一。

有助於整個生產能力的提高。

第三，促進了大陸現有企業的技術改造。「六五」期間，中共引進了三九〇〇多項技術、關鍵設備和生產線，成交金額達三七億美元。中共認為這些擇優引進的項目，大都屬於七〇年代末和八〇年代初的水平，具有投資少、見效快、收益好的特點。

第四、提高了中共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能力。例如，一九七九年，電子工業共引進二〇〇〇多項國外先進技術和設備，增強了電子產品的國際競爭能力，也促進了出口。一九八一年電子產品出口額為一一五七萬美元，一九八六年上升為一九億美元，一九八七年上升為二億多美元。

第五、學會了現代化大生產的很多管理經驗。如打破鐵飯碗式的勞動就業制後，採用合同制、聘用制等。

第六、加強了中國大陸交通運輸和能源的基礎建設。

第七、提高了農業發展的潛力。

第八、為充分利用和開發大陸勞動力資源創造了條件。對外開放十多年來，利用外資一萬多個項目，這對增加大陸勞動就業產生了一定的作用。<sup>(46)</sup>

實際上，根據台灣地區研究大陸經濟問題學者的看法，大陸經濟經過十幾年來的發展，在體質上已發生了改變，其特徵可歸納為下列三點：

第一、國際化程度大幅提高。以對外貿易總值佔國民生產總值之比重作為指標，在改革開放初期仍低於百分之十，到了一九九二年時，則已提高到百分之四十左右。

第二，非公有化的程度逐漸提高。以工業總產值的結構為例。在一九八〇年代初期，全民所有制所佔的比重接近百分之八十，集體所有制及其他所有制約各佔百分之十六及百分之五左右。到了九二年，全民所有制所佔比重減至百分之五十左右，集體所有制的比重提高到百分之二十六，而包含鄉鎮企業、私營經濟、個體戶及外商投資企業的其他所有制企業，比重增至百分之二十四以上。

第三、市場化的程度提高。迄目前為止，消費品方面已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係透過市場來分派，生產資料方面雖維持雙軌制，但在計劃管制範圍內的部分，就項目而言，僅二十多種；就產值而言，約佔百分之三十左右。換言之，計劃控制的主導作用在減弱之中。<sup>(47)</sup>

(46) 同上，頁一一一～一二六。

(47) 高長，「大陸經濟能勢與投資機會」，貿易週刊，一五三九期，民國八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頁七。

無論是中共學者所提出的十年改革成就，或是台灣學者分析大陸經濟改變的特徵，顯示出未來大陸經濟發展的正面趨勢。雖然這些成果並非完全拜對外開放之賜，許多方面是經濟體制改革的結果。但基於改革與開放的相互關聯性，我們無法否認對外開放對大陸經濟產生的「加速器」作用。

與此同時，對外開放在經濟層面引發的負面效應，亦值得吾人注意。其中最為嚴重的是：第一、經濟波動的問題。自一九七九年以來，大陸已經有了三個循環週期。最近有關大陸經濟是否過熱的問題，再度引起海內外各界的關注；第二、以沿海地區作為對外開放的重點，以及鄧小平所謂「先讓部分人富起來」的說法，已造成大陸區域不平衡發展，以及城鄉貧富差距愈來愈大的問題；第三、地方經濟勢力逐漸擴大，形成經濟割據的局面。由於中央宏觀調控能力受到削弱，對地方鞭長莫及，不易維持經濟穩定發展。<sup>④8</sup>

上述這些問題如果處理不當，將直接反映到上層建築，造成中國大陸政治、社會，乃至意識形態領域的混亂。

## 二、對外開放與反資產階級自由化

如前所述，共產黨人一向非常重視理論。在中共黨史以及一九四九年中共政權成立後的政治發展過程中，意識形態的鬥爭，往往為政治運動或權力鬥爭揭開序幕。中共或許意識到對外開放可能會對中國大陸的思想領域帶來衝擊，因此，緊接著改革開放政策的推動，葉劍英於一九七九年九月，在中共慶祝「建國」三十周年的講話中，首次明確地提出了「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概念，認為在建設物質文明的同時，也要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自此以後，中共官方文件和領導人，即多次提出建設兩個文明，一為物質文明，一為精神文明的說法。

對中共而言，對外開放由物質文明建設擴大到精神文明建設，對整個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有促進和推動的作用，同時也帶來新的挑戰。前者表現為：第一、經濟開放促使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會使人們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增加信心，也增強建設社會主義的決心；第二、全方位的對外開放，提供人們直接認識現代資本主義優劣點的機會；第三、對外開放促使人們更新觀念，拋棄落後陳舊的觀念和生活方式，推動文明、健康、科學的觀念，從而激發出社會主義建設的「熱情」；第四、對外開放帶來物質文明的飛速發展，為精神文明建設提供了物質基礎和條件。至於挑戰的部分，中共學者認為，當面對發達的資本主義世界時，「各種困惑、懷疑、動搖、失落等狀態接踵而至。例如，在比較兩種制度生產力的大小時，一部分人會產生「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的結論；資本主義「腐朽」的人生觀、價值觀、道德觀也會

<sup>④8</sup> 同上，頁八。

會主導思想的「熱情」；第四、對外開放帶來物質文明的飛速發展，為精神文明建設提供了物質基礎和條件。至於挑戰的部分，中共學者認為，當面對發達的資本主義世界時，「各種困惑、懷疑、動搖、失落等狀態接踵而至。例如，在比較兩種制度生產力的大小時，一部分人會產生「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的結論；資本主義「腐朽」的人生觀、價值觀、道德觀也會

毒害人們的心靈；此外，由於太過注意外國的長處而會產生「自卑感」，以及片面強調自己的優點而滋生盲目的「自大感」。<sup>49</sup>

上述的「挑戰」已成為中共內部各種敵對勢力用來從事權力鬥爭藉口。一九八〇年十二月，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即提出要批判和反對「崇拜資本主義、主張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傾向，批判和反對資產階級損人利己、唯利是圖、『一切向錢看』的腐朽思想，批判和反對無政府主義、極端個人主義。」鄧小平認為，中共在學習西方資本主義長處的同時，也必須「在思想政治領域把上述的鬥爭進行到底。」<sup>50</sup>

很明顯地，隨著西方科技和資金的引進，諸如「自由」、「民主」和「人權」等觀念，也在中國大陸散播開來。中共擔心共黨建立的整個事業「會被沖亂」，因此所有這些觀念皆被戴上「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的帽子。

一九八七年二月一日，中共「人民日報」在「社論」中，公布了中共官方對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的「立場」，包括：1.持續開展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2.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嚴格限於黨內，不要聯繫經濟改革的政策、農村政策、科學技術研究、文學藝術風格技巧的探索以及人們的日常生活。3.針對黨政軍機關、城市企事業單位和人民解放軍的廣大黨員進行正面教育。4.農村不搞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5.這場鬥爭不涉及民主黨派和黨外知識分子。很明顯地，改革派希望將運動限於政治思想領域，但保守派卻認為這個運動應在「全國範圍內開展」。此一因對外開放而引起的政治運動，再度成為中共內部派系鬥爭的工具。<sup>51</sup>

### 三、對外開放與反貪污腐化

對外開放對於中國大陸造成最大影響是帶來了嚴重的社會問題。中共官方將此現象歸咎於外來的思想和內部的壞分子。中共中央在一項文件中指出：

「實行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經濟政策以後，黨的思想政治工作和一些必要的管理制度沒有跟上去，外來資本主義思想的滲透、國內新老社會渣滓的乘機搗亂，使一些早已絕跡的社會醜惡現象重新出現。這種種因素，不但嚴重擾亂了社會

<sup>49</sup> 方生，*走向開放的中國經濟*，頁三九六～三九七。

<sup>50</sup> 鄧小平，「貫徹調整方針、保證安定團結」（節選），引自鄧小平同志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七月），頁七二～七三。

<sup>51</sup> 見「中共再度展開『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短評），中國大陸研究，第二十九卷第八期，民國七十六年二月，頁一～二。

治安，敗壞了社會風氣，而且使危害人民安全、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犯罪活動得以滋生和蔓延。」<sup>52</sup>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來的社會治安確實不好。其中以經濟犯罪、青少年犯罪和各種謀財害命的暴力案件最為嚴重。單以大陸各級法院管理在案，比較嚴重的經濟犯罪案件為準，一九八〇年時只有四千宗，一九八五年躍升至四萬二千宗，一九八九年再增至七萬六千七百宗，九年之間，升幅高達二十倍，平均每年以百分之三十八的速度增加，一九八九年又較一九八八年上升百分之三十一，可見來勢之兇猛。<sup>53</sup>另外，以青少年犯罪問題為例，一九七九年以前三十年幾乎聞所未聞，但八〇年代卻直線上升。一九七九年，大陸法院審理的十八歲以下青少年犯，一共只有四千九百餘人。十年後的一九八九年，則增至二十九萬三千宗，而且增幅又以一九八五年以後最為可觀。<sup>54</sup>

固然，西方資本主義的物質誘惑，以及在生活方式上展現的某些頹廢作風，對中國大陸造成了衝擊，然而，中共各種制度的不健全，以及大陸民眾對自己民族的傳統和文化缺乏足夠信心，使中國大陸對外開放後，「毫不設防地將自己的脆弱面，完全暴露在西方文化的腐蝕影響之下。」<sup>55</sup>更嚴重的是，中共幹部本身的貪污腐化，對於整個社會問題的惡質化，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曾於一九八七年十月廿五日，在中共「十三大」的報告中，約略歸納幹部腐化的情形為：「偷稅漏稅，走私販私、行賄受賄、執法犯法、敲詐勒索、貪污盜竊、洩漏國家機密和經濟情報、違反外事紀律、任人唯親，打擊報復、道德敗壞等。」<sup>56</sup>中共認為，一些黨政機關和執法部門的領導幹部，直接或間接經商辦企業，是大陸實行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突出問題。事實證明，當前社會存在的諸種腐敗現象，都和它緊密相聯。「此風不刹，直接影響我國的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sup>57</sup>

為了解決大陸社會的腐化問題，中共總理李鵬今年三月十日在為中共「八屆人大二次會議」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特別強調「認真搞好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穩定治安形勢」當作「今年政法工作的突出任務。」<sup>58</sup>

<sup>52</sup> 「中共中央關於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的決定」（一九八三年八月二十五日）（節選），引自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頁二五八。

<sup>53</sup> 引自張保民，「中共開放政策所帶來的社會問題」，中國大陸研究，第三五卷第八期，民國八十一年八月，頁四五。

<sup>54</sup> 同上，頁五九。

<sup>55</sup> 同上，頁四二～四三。

<sup>56</sup> 香港文匯報，一九八七年十月廿六日，頁一〇。

<sup>57</sup> 本刊評論員，「認真搞好領導幹部的廉節自律」，求是雜誌，一九九三年第二十期，頁二二三。

<sup>58</sup> 人民日報（海外版），一九九四年三月廿四日，第二版。

(55) 同上，頁四二、四三。

(56) 香港文匯報，一九八七年十月廿六日，頁一〇。

(57) 本刊評論員，「認真搞好領導幹部的廉節自律」，求是雜誌，一九九三年第二十期，頁一、三。

(58) 人民日报（海外版），一九九四年三月廿四日，第二版。

#### 四、對外開放與反和平演變

中共認為，「在粉碎『四人幫』以後，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經過對外政策方面的調整、充實、發展，使我們的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更加全面和完善，開創了『建國』以來最活躍、最有利的時期。」<sup>(59)</sup>

為了塑造有利於中國大陸經濟建設的外在環境，中共自七〇年代末期開始，即致力於調整它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與美國的關係。美國與中共的完成「關係正常化」，從某種角度看，可以視為中共外交政策改變後的一個重大結果。如前所述，中共對外開放的一個主要目的，是在獲取西方的先進科技和資金；與此同時，中國大陸擁有的廣大市場和豐富的天然資源，也是西方國家展開與中共對話、接觸的重要誘因。

很明顯地，北京採取的對外開放政策，已使中共的對外關係得以大力擴展。而整個國際政經情勢的演變，亦提供中共從中運用的機會。一九八五年三月，鄧小平在會見日本商工會議所訪問團時，發表了「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的兩大主題」的談話，隨後並作進一步的詮釋。根據鄧的說法，發展是一根本性問題，而發展的「核心問題」是經濟問題。為了發展經濟，世界各國都要求一個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鄧認為，如果中共在經過三五十年的建設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則將成為制約戰爭的力量，「戰爭就更難打起來。」<sup>(60)</sup>鄧的說法成為中共官方詮釋國際局勢的藍本。而和平與發展，則是當今各國，特別是第三世界國家，追求現代化的基本需求。中共以此作為對外政策的訴求概念，自然容易引起「共鳴」。

除此之外，我們發現對外開放亦是促使中共改變對台策略的一個重要因素。中共認為從一九七九年元旦，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後，中共的對台政策即由「武力解決」轉變為「和平統一」。對外開放自然包括對台灣的開放，中共期望透過「雙向交流」，完成其「一國兩制、和平統一」的目標。

中共雖從對外開放政策中獲取重大的外交利益，但與西方擴大接觸的同時，北京領導階層又擔心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會藉機對中國大陸推動「和平演變」戰略。根據中共的解釋：

「和平演變是國際敵對勢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對社會主義國家採取的一種既定戰略。它是指資本帝國主義在保持強

大軍事威懾力量的前提下，在同社會主義國家長期進行的多方面接觸和交往過程中，運用非戰爭的手段、方法、促使社會主義國家從內部發生質變的演變。其實質是使社會主義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等重大方面發生資本主義性質

(59) 姚全海、林吉慶主編，《國際政治與中國外交》（大連：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七年七月），頁三四一。

(60) 烏杰、鄧小平思想論（太原：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九月），頁二三二、三三四。

的變化，把社會主義國家納入資本主義的軌道，恢復資本主義世界的一統天下。」<sup>61</sup>

雖然中共認為，西方對社會主義國家實施和平演變戰略由來已久，但對外開放，顯然提供了西方更大更多的機會，加速此一戰略的運作。例如，「美國之音」的廣播，以及雙方經貿聯繫導致大陸經濟的「市場化」或「私有化」，皆被中共視為西方推動和平演變的手法。尤其是，中共與西方的文化交流，也被視為是一種文化滲透。例如，中共指責美國藉雙方交換留學生「極力培養親美政治勢力」。中共曾引述雷根總統的話說：「要把接收中國留學生作為一項戰略投資。」並引述美國新聞署的觀點，指稱：「美國應向中國正在成長的年輕一代灌輸美國的基本價值觀念，這是比傳授科學知識本身更為重要的任務。」所有這些引述皆在強調美國對大陸進行的和平演變戰略。<sup>62</sup>

為了對抗來自西方的和平演變戰略，中共已在中國大陸推動一場含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外交等各個領域的「全方位」反和平演變運動。<sup>63</sup>很明顯地，中共當局已將這場「和平演變與反和平演變的鬥爭」，視為攸關中共政權存亡的重大問題。

## 伍、結論

從本文的分析過程中，我們瞭解到，無論從理論或現實的觀點出發，中共皆不可能，也沒有理由，讓擁有十二億人口的中國大陸社會，持續停留在一個「自我封閉」的狀態。因此，中共採取對外開放政策，基本上符合世界局勢的潮流，也能滿足中共本身的主觀需求。但另一方面，中共將「對外開放」概念限定在「有原則、有條件、有限度」的開放，亦具體反映出，中共對於對外開放的認知，有其特殊的含意，值得吾人細加推究。

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決定論」，以及社會主義改革的歷史經驗，促使北京領導階層以相當「唯物」的觀點，選擇了中共對外開放的戰略與策略。中共對外開放的目標，顯然是着重在經濟利益的考慮。但決定政治發展和社會變遷的諸多因素中，經濟因素絕非孤立存在的。換言之，伴隨着西方物質文明的引進，屬於中共眼中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立刻在中國大陸散播開來。中共今天面對的最大挑戰，即是如何應付下層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相互激盪帶來的衝擊。以中共的術語而言，這是嚴重的「內部矛盾」問題。

<sup>61</sup> 董耀、胡克、白廣元編著，《兩種制度的生死較量——和平演變與反和平演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十二月），頁一〇。

<sup>62</sup> 馮特君，〈對外開放與今日中國〉，頁一四七—一四九。

<sup>63</sup> 中共在這方面採取的具體對策和措施，歸納起來多達十八項，詳參董耀鵬等，《兩種制度的生死較量》，頁二五—二六二。

中共認為「四項基本原則」的提出，應屬先見之明。中共統治當局顯然期望透過辯證的手段，將兩個基本點之間的矛盾，統一在經濟建設的中心課題上。但問題纏結卻出在「四項基本原則」這個基本點。換言之，面對改革開放，特別是對外開放的衝擊，中共已無法維持其四個堅持。因為，四個堅持本身已在腐蝕之中。

⑥1 董耀、胡克、白廣元編着、兩種制度的生死較量——和平演變與反和平演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十二月），頁二五—二六二。

⑥2 馮特君，對外開放與今日中國，頁一四七—一四九。

⑥3 中共在這方面採取的具體對策和措施，歸納起來多達十八項，詳參董耀鵬等，兩種制度的生死較量，頁二五—二六二。

中共認為「四項基本原則」的提出，應屬先見之明。中共統治當局顯然期望透過辯證的手段，將兩個基本點之間的矛盾，統一在經濟建設的中心課題上。但問題癥結卻出在「四項基本原則」這個基本點。換言之，面對改革開放，特別是對外開放的衝擊，中共已無法維持其四個堅持。因為，四個堅持本身已在腐蝕之中。

蘇聯社會主義制度從形成、發展到沒落的過程，提供了一個有用的教訓。在布里茲涅夫長期的統治之下，蘇聯以有限的開放來嘗試各項改革措施，共黨此時扮演的是改革者的角色。在布里茲涅夫提出的「發達社會主義社會」概念中，加強共黨領導是一項重要的內容。布里茲涅夫或許認為，維護共黨的既有權益應是排除改革障礙的必要手段。結果是，共黨自身的腐化成爲蘇聯社會腐化的濫觴。

戈巴契夫上台後，意圖擺脫歷史的包袱，他讓蘇聯共黨制度「自我消亡」，並且採取全面對外開放的政策，希望因此改變蘇聯社會的體質。結果是，蘇聯政治體系趨向瓦解，蘇聯社會分崩離析。殘酷的政治現實使戈巴契夫的改革理想，變成了一个浪漫的憧憬。我們可以大膽的假設，戈巴契夫的「開放」政策對蘇聯形成的衝擊，超過了他的「重建」構思。換言之，蘇聯的民主改革無法承受自由化引發的震盪。

以中國大陸內部的政經結構看，在沒有建立一套完整的配套措施之前，對外開放是一項大膽的政治冒險行爲。即使沒有西方的和平演變戰略，我們亦懷疑中共統治當局能夠有效處理因對外開放而產生的「人民內部矛盾」。到目前爲止，我們看到了因對外開放而導致中共中央與地方關係的改變。同時，民衆因爲經濟生活的改善，加強了他們對於政治生活的參與感。中共至今似乎仍迷信以高壓手段面對此一潛在的政治參與危機。只是，這樣的應變措施能夠維持多久？除非中共回到「自我封閉」的時代，否則，我們懷疑中共有多少統治工具能阻止大陸民衆呼吸來自外界的自由空氣！？